

—— 毛泽东读过的古农书 ——

《补农书》 新解

周邦君◎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S-092.49

20121

毛泽东读过的古农书

《补农书》 新解

周邦君◎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补农书》新解 / 周邦君著.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0.12
ISBN 978-7-80752-740-4

I. ①补… II. ①周… III. ①农学—自然科学史—中
国—清代—文集 ②补农书—注释 IV. ①S-0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6231 号

《补农书》新解

作 者 周邦君
责任编辑 童际鹏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9.875
字 数 2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740-4
定 价 2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序

原籍蜀中的学人周邦君（笔名周福春）写成一部专著，初冠名为《毛泽东学过的〈补农书〉新解》，现为《〈补农书〉新解》（简称《新解》）。全书主体分为五篇，计十八章，论及农业技术、农村经济与社会等问题。其中谈到《补农书》与农业文化的关系——这方面的内容相对容易引起读书人的注意，也让作序者感慨系之。

文化是一个大词、常用词，有时也成为时髦词，为众多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由于人生阅历、学科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人所理解的文化则大相径庭。众所周知，泰戈尔算得上现代东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不过，并非人人对他恭敬有加。民国年间，泰戈尔访华时，多次谈到中国文化。辜鸿铭听着有些厌烦，不无讥讽地说：泰氏根本没有读过《易经》，谈什么中国文化？辜氏的批评当然有些道理，但不免偏激之弊。没读过《易经》的人，未必就不能谈论中国文化。若以中正平和的心态来看，凡是对中国文化某一局部问题有一定了解和研究的人，都可以谈论。倘若将中国文化高高地放在象牙塔的顶端，视为少数精英人物才能享用的禁脔，实际上很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基本观点，人们必须首先解决吃、喝、住、穿等基本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文艺、宗教等活动。而要解决吃、穿等问题，人类不得不仰仗于农业。自古及今，不管人类社会如何变化，这一条铁定的规律都是改变不了

的。可以说，在全人类文化系统中，农业乃是最为深刻和广泛的基座部分。人们唯有从农业基座出发，才能有力地解释人类文化的复杂结构。遗憾的是，很多谈论文化的人（甚至一些自我标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恰恰是本末倒置的，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果人们脱离农业而谈文化，其缺陷似乎比不读《易经》要严重得多。在英语中，农业拼作 agriculture，可以分解成两部分：agri—就是土地的意思，而 culture 有耕作、培养、文化等含义。如此看来，农业不妨理解成农民从土地耕作中创造出来的文化。费孝通等人讲乡土中国、乡土社会、乡土文化，其学术根源其实就在这里。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传统农业文化极为发达，明显超过其它国家和地区。工商化时代魔幻般地积累了大量的物质产品，但从精神产品来看，经典性的创作尚远远不及农业文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流传下来的各类典籍皆不胜枚举。从最具基础性而作为农业文化主要载体的农业典籍来看，专门性的农书就多达成百上千种。其中，骨干性的农书也不下数十种。不过，农书的具体内容如同农民的生产劳动一样，简直繁杂得要命，显然比不上文学艺术类典籍那样引人入胜。古代儒家学者每每将农作视为小人之事，而现代读书人也多半抱着跳农门的意念——跳得越高，本事就越大。明代杰出学者宋应星沉痛地说：《天工开物》“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较之稍晚，沈氏、张履祥的《补农书》也属于性质类似的作品。除了少数从事专门研究的学者之外，很少有人愿意下功夫去读这种书。前国务委员、农业专家和生态学家姜春云曾经指出，农史圈专业人员不多，但贡献很大。随着当代社会经济变迁所造成的文化市场颠簸，即便是在农史界，农书研究也处于日益冷落之地。

在这样的宏观文化背景中，邦君潜心磨炼出《新解》，应该说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情。他曾到文化名城南京，拜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张芳研究员为师，攻读中国科学技术史，先后获得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早在民国时期，南京

作为都城，也是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的中心。建立于此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蜚声海内外，涌现出一大批顶尖级的学者。其中，张芳是中国农田水利史学的开创者之一，但不幸于数年前突然病逝。除了得到张芳研究员的多年指导外，邦君还亲炙叶依能、王利华、王思明、惠富平等先生教泽。藉此，他在乡土文化研究的基本功方面，受到了良好的训练——有些训练堪称绝活，在其它高校和科研院所里是见不到的。近些年来，身处广州这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城市，他依旧不忘农业之本，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仍然牢记诸先生教导，并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本来，对于《补农书》这部杰出的科技作品，著名学者陈恒力、王达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合力作过研究，出有专著；此后，陆续有人写过相关的一些论文。照一般情况，为了避免“炒剩饭”的学术忌讳，邦君没有必要在《补农书》上面费心劳神。明知如此，他竟然没有退却，可见其为学魄力之一斑。

邦君的作品既然号称“新解”，是否是在广告轰炸时代为哗众取宠而炮制的欺人之谈呢？要了解其“新”之所在，不妨顺着其结构体系进行扫描：

第一篇第一章首次考察了毛泽东与《补农书》的因缘，并揭示了《补农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一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是难以想到古农书这一国学基础方面去的。另一方面，研究农业历史文化之类专业的学者，通常不会注意到中共领袖人物会读农书这类枯燥的科技文献。《新解》能够在毛泽东与《补农书》之间找到关节点，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创新，而并不是简单、庸俗地扯虎皮、拉大旗之举。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经历了神化、妖魔化的曲折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正常化、具体化的局面。

第二篇关于农业技术与农村经济的部分，较前人的成果有所进步。陈恒力、王达所著的《补农书研究》（简称《研究》）也谈到水利问题，但《新解》侧重于张履祥的角度，论述更为条畅。

关于农村价格,《研究》仅有选择性的评述,遗漏较多,而《新解》立足于《研究》之上,对《补农书》中的价格资料重新作了地毯式的全面梳理。至于《新解》所论农具利用、农村手工业与商业问题,前人都没有专门论述。

第三篇《生态环境与社会调适》、第四篇《农业活动与灾害防治》,可以理解成荒政方面的内容,合为九章,几乎占全书篇幅之半。荒政既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也与农业技术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后期以来颇为热闹的荒政史、环境史研究中,大部分学者看重朝廷的典章制度,看重官吏、绅士、慈善机构的作用。可惜,农民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地位不见了。他们要么成了荒政事业可怜的救助对象,要么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这样的历史书写方式,只能获得颠倒、歪曲的镜象。《补农书》尚未见他人从荒政与环境相结合的角度予以考察,而《新解》自觉地将荒政、生态环境与广大农民的一系列技术性生产活动联系在一起。这就充分肯定了:农民对于荒政事业和农业环境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如果要问:什么是唯物史观?什么是劳动农民的历史?这就是答案。

最后一篇论述农业实践与乡土文化的关系。即使在专业性较强的农史界,也很少有作品将农业劳动实践同乡土文化有机统一起来。多数学者谈论乡土文化时,实际上离开了农民的生产活动,离开了土地和农业生物,基本上是关在玻璃窗里面做文章。在工商化时代,很少有人愿意对农耕文化进行深入探讨。《新解》第十五章首次系统论述了《补农书》与农耕文化的关系,在这一饱受冷落的学术领域尽到了一分责任。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很大程度上通过该民族的谚语表现出来。农谚是广大农民生产、生活的经验积累,最能显示农民的智慧,因而成为乡土文化系统中的精品。《新解》第一次全面清理了《补农书》的农谚,分析了它们的来源、标示、分布、语言特色、运用与流传情况。《新解》第十七章将《补农书》与《春蚕》进行比较研究,其角度新颖、文理交叉的鲜明特点,在学术史上尚属罕见。学过《春蚕》的读者数以

亿计，但是，将《春蚕》与《补农书》作出比较研究的，迄今没有见到第二个人。《新解》第十八章从伦理学的角度解读《补农书》，这也是前人在研究农业古籍时几乎未曾采用过的新角度。

看来，邦君难能可贵地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淳朴本色，在《新解》中确实捣鼓出了一些新鲜的东西。其显著创新在于，从环境、技术、经济、荒政、文化、社会诸多角度出发，对《补农书》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这里显示了持续农业的纯真，肯定了辛劳农家的善良，勾画了广阔农田的美丽，也揭示了农村生活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新解》对照古今之异，牵涉中外之变，总结历史经验，为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尤其是建设新农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一者，《新解》附录十则浅近文言笔记和一首现代诗歌，也与正文内容有着本质的联系。其主旨在于表达作者对于农业文化的痴情、对于现代文明的杞忧（但愿是杞忧）。二者，邦君具有较好的文学功底，亦略解音律，所以他的文字之美，颇令人刮目相看。对此，张芳、叶依能、郭文韬、罗仑等学者皆有认定。慈鸿飞教授（先后任职于南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曾经感叹地说：邦君的文字，隐约带有民国时期一些学者的韵味，读起来感到幸福。顺便一提，邦君小学毕业考试作文，得到的是满分。因此，《新解》的文字功夫，自然不是一时半刻练成的。

进一步言之，文、史、哲实为一体，而在中国传统时代尤其如此。例如，先秦诸子之学（尤其是儒学），都可以说是农业文化的结晶，或者是立足于农业的文化。孔子虽不满意樊迟问稼，但他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其意在以仁为核心、以均为手段来消除贫困，进而追求“和无寡，安无倾”的目标。“均”的对象，是衣食等类农副产品，主要在于使农民等社会群体“无贫”。孟子主张“民贵君轻”，其中的“民”主要指的是农民。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有不少农事诗和农业祭祀诗，如《甫田》、《大

田》、《丰年》、《载芟》、《良耜》等，而《国风》中最长的《七月》，则是一首形象描写“三农”的名诗。其后，中国不少文人表现农事、农民，描绘农村（特别是田园），成为诗歌一大题材类别；而且，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三农”。时至今日，即便是在工商化、信息化水平较高的欧美社会，品尝绿色食品，欣赏田园风光，永葆田园牧歌情怀，也仍然是一件赏心乐事。人们若是参照这等情形，回头再看《新解》，就会觉得其农业学术之真、道德情操之善、文学艺术之美，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和谐统一。

话又说回来，一分为二地看，《新解》也不可能没有缺点。除了个别材料的重复利用（其角度不同，似乎也情有可原）这一问题之外，该书所引用的其它文献不算广泛，说明他的学术功力不可作出过高估计。如果能够将《补农书》与其它更多农书（包括外国农书）作出系统的比较研究，岂不更好？

以上感想，是一个远在农史圈外的、执教四十来年的文学教授主要从文化角度进行观察而得到的。在通常情况下，隔行如隔山，但有时候，所谓外行看内行，也许能够看到一些别致的风光。这些评述，诚望文化人有兴趣来关注中国的“三农”；而对于真心实意关注“三农”的文化人来说，若不阅读这部《新解》，就很可能造成某些遗憾。

作序者与邦君交往近三十年，深知他很有些恋旧情怀。这种人不容易忘本，最值得深交，但其社会适应能力相当令人担心。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界来看，热爱农业文化、厌恶工商文化的诗人顾城和海子，都选择了极端的归宿方式。邦君应当尽可能中庸些，消除对工商文化的不满情绪，自勉自励，拿出更好的作品来促进社会的和谐。

是为序。

郑家治 二〇一〇年八月 于西华大学之醉醒斋

绪 篇

一、学术史述论

古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① 这是中国先农对读书人发出的忠告：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它带着善意和幽默，具有地地道道的农业文化特色。博士一词，自有古今差异，姑且置之不论。但笔者忝居博士之位，自应警觉，让本书写作尽快切入正题。题目说得明白，要解读毛泽东学过的《补农书》。对于毛泽东，谁人不知？一般介绍不必要，而专业探讨又不是绪论部分所能担当的任务，所以按下不表。但是，对于《补农书》及其研究情况，就不得不费些笔墨了。《补农书》（有时题作《沈氏农书》）系明末湖州府涟川沈氏和明末清初嘉兴府张履祥农学著作的合称，洵为中华农业文明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民国初年，学识广博、论断大胆的梁启超很可能是有意听信传言，声称该书遭到了版本毁灭的恶运。^② 事实上，《补农书》自产生以后，流传较为

①（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王利器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77页。按，为方便读者阅览，本书采用脚注。由于参考文献在脚注中已然标明，故附录不予一一列出。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广泛，版本不下十种。凡考察明末清初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学人，皆在不同程度上以之为重要参考对象，零星引用《补农书》者可谓不计其数。

就专业性的研究而言，不少学者针对《补农书》撰写论文、论著，发表看法。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学术动态，可以列出下面一些。章楷《从〈补农书〉看三百年前浙西农民的施肥技术》（载《浙江农业科学》1962年第2期）对照现代肥料科学知识，高度评价《补农书》所载浙西农民的施肥技术。^① 杨生民《从〈补农书〉看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从该书观察到关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若干现象。薛国中《从〈补农书〉探索十五至十七世纪中国农村经济关系的变化》（载《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5期）主要根据该书探索近古时期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情况。俞荣梁《建立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补农书〉的启示》（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从书中得到启示：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当借传统的生态农业技术经验。严清华《〈沈氏农书〉经营管理思想初探》（载《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6期）初步讨论了书中的经营管理思想。游修龄《〈沈氏农书〉和〈乌青志〉》（载《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1期）发现《沈氏农书》在稻作技术方面受到李乐所编《乌青志》的直接影响。叶依能《从《补农书》看经营地主经济的性质》（载《农史研究》1990年第10期）分析了书中关于经营地主的农业经营方法，并论证其封建经济性质。赖作莲、樊志民《〈补农书〉所见经营地主管理的现代化因素》（载《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从书中观察到，明清之际江南经营地主的管理经验，与现代农业管理科学有

① 历史地理学表明，浙江本指钱塘江，而《补农书》的故乡嘉、湖地区，处于钱塘江以西，原为浙江西道（简称“浙西”）的一部分。古人和一些研究古籍的现代学者，每每将《补农书》与“浙西”联系在一起，实出于古老的习惯。但是，查看明清以来的历史地图可知，嘉、湖乃在浙江省北部地区。本书在论述过程中所指称的“浙北”，即取此义。

不少相通之处。颜玉怀、邹德秀《〈补农书〉的农业经营管理思想研究》（载《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重新讨论了《补农书》的农业经营管理思想。与此相关的是，马欣荣《〈补农书〉所见经营地主的经营策略》（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进一步考察了该书关于经营地主的农业经营策略。周广西《〈沈氏农书〉所载水稻施肥技术研究》（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专门探讨该书所载水稻施肥技术经验。王加华《从〈沈氏农书〉看传统时期江南蚕桑区的土壤耕作》（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讨论了《沈氏农书》所载嘉湖蚕桑区的土壤耕作技术经验。另外，日本一些学者也比较看好《补农书》。例如，田中正俊《〈補農書〉をめぐる諸研究——明末清初土地制度史研究の動向》（载《東洋學報》1960年第1期）注意到该书所载土地制度方面的问题；足立啟二《明末清初の農業經營——《沈氏農書》の再評價》（载《史林》1978年第1期）论述了其中的农业经营思想。相比之下，农史学家陈恒力、王达的成果最为引人注目。陈恒力点校《沈氏农书》（中华书局，1956年），并与王达奔赴该书故乡（杭州、嘉兴、湖州一带）学习、工作、生活，积多年调查研究的心血而著成《补农书研究》（中华书局，1958年；农业出版社，1961、1963年）和《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62、1983年），皆为典范之作。^①

从人们对《补农书》研究的基本趋势来看，学术界并不因为有了陈、王所建立的学术高峰而放弃对这部农书的继续探讨。在学术心理上，避免炒剩饭，当然是明智的选择。但是，真正的经

① 陈恒力（1911—1978），辽宁法库县人。他于1938年到延安马列主义研究院研究哲学、经济学，后来担任过原松江省水利局局长、农业部编译处处长、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之前身）副主任等职。他与万国鼎组织、整理《中国农业遗产选集》和部分古农书，并参编具有拓荒性质的《中国农学史》（初稿）。其学术成果尚有《〈管子〉地员篇研究》、《前汉时代的农业生产》、《补农书研究》等。王达（1928—），安徽芜湖人。他是万国鼎、陈恒力的得力助手之一，曾参与中国农业遗产的大量整理工作，参编《中国农学史》（初稿）、《补农书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等著作，发表《试论〈补农书〉及其在农史上的价值》等论文。

典作品，是并不嫌弃、而且是经得住多次讨论或翻译阐释的。周树人认为，莎士比亚之作，除朱生豪的译本外，也可以提倡其他人翻译的本子。西谚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实为接受美学通情达理之论。学术研究确有权威现象，但权威与垄断是格格不入的。据罗志田等学者的经验，哪怕看似死去的材料，只要能找到新的方法和视角，也可以将其盘活。随着时代、地域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迁，人们对同一问题所采用的参照系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因而对同一作品的理解定然有所不同。例如，20世纪中期，陈恒力、王达虽然注意到桑基培护等农业活动对地形改造所带来的影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想到工商业化、城市化进程会对农业、农村、农民带来21世纪初这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尤其不可能预见到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为祸之烈。那时，他们对工业化、城市化未必有明确的批判态度。前人研究《补农书》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是从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农业经营管理方面下功夫；即使在他们着力较多的经济方面，也有某些具体问题（如水利、农具、手工业与商业、特别是农村价格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何况该书还可以从新的角度（如荒政、文化等角度）予以考察。因此，那种认为《补农书》不用再加研究的看法，未必就是理所当然的定论。

二、研究意义

中华文明之最深厚的基础，在于历史绵长的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各地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威胁人们的生存。明清处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气候异常期，灾害频率之高，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王朝重视备荒救灾工作，将荒政作为基本国策。但是，当荒政实施之际，官方、善人和慈善机构对灾民的救助不可能是长期性的，而最具常规性、可靠性的环节，乃在于发展农业，在于农民生产自救，是为根本大计。古代中国农书讲述这方面的知识往往

不少。《补农书》作为一部杰出的地方性农书，比较详细地反映了明末清初湖州、嘉兴地区农业生产的宝贵经验。其中论述荒政的内容较多，但迄今尚未见有人进行专门性的讨论。本书立足于陈恒力、王达等学者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即从荒政与环境、经济、文化等方面相结合的视角，对《补农书》予以重新观照，因而具有别开生面的学术意义。

湖州、嘉兴一带，属于向称富庶的江南地区的核心部分之一，其农业经济相当发达。之所以如此，农民所发明和采用的防灾减灾技术，无疑产生了较官府救荒政策更具有关键性和实效性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虽然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大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是，中国近些年来情况说明，每年由于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仍然高达数百亿、甚至上千亿元。像 2008 年的“5·12”大地震，是人力不可控制的，当时人们只有尽力逃避。2010 年西南大旱灾、华中大水灾，波及面很宽，损失也非常严重。无论如何，灾后重建家园的道路艰辛而又漫长，农业生产的恢复至为迫切。《补农书》所记载的荒政措施，就其主要部分而论，仍然存活在农民的生产实践中。如何自觉地将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更为有效地降低灾害损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具体而言，通过本项研究，从《补农书》中吸取先民所总结的古代中国先进地区的荒政经验，对于当今时代的农村防灾减灾工作，不乏现实的启迪。而《补农书》关于环境、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也可以给后人提供相应的参考。中国共产党历届领袖人物，向来重视国情研究和教育。毛泽东曾学习《补农书》，摘录其中部分内容。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领袖与古农书的关系。自 20 世纪末期以来，全国上下高度关注“三农”问题，涌现出不少德才兼备的专家。毋庸讳言，也有一些人难免有盲目跟风之嫌。他们对农民的劳动生活并不熟悉，缺乏反映这种生活的话语体系，其思想言论只能漂浮在中华乡土社会的浅表层面，甚至远远地游荡在玄虚的空间。针对这种弊端，本书继承前辈学者关心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学术精神，通过

对《补农书》的重新审视，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当时农民的生产 and 生存实态，而且对现在和将来的中国“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本项研究也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关于研究的基本内容，本书抓住四个部分进行论析，共分五篇，十八章。第一部分编为第一篇《伟人思想与农学杰作》，讨论毛泽东与《补农书》及其相关问题。第二部分编为第二篇《农业技术与农村经济》，从《补农书》观察农业水利、农具、农村手工业、商业（尤其是价格）诸问题。第三部分是关于荒政与社会方面的内容，编为第三、四两篇。第三篇《生态环境与社会调适》，考察《补农书》的肥料技术与生态农业状况、自然灾害与荒政措施、灾异与社会调适问题，并在其间穿插介绍沈氏的荒政专论《奇荒纪事》。第四篇《农业活动与灾害防治》，先考察沈氏视野中的稻作、桑蚕技术与灾害防治问题，再讨论张履祥笔下的作物栽培技术及农业生产其它细节与灾害防治事宜，然后补充论述沈、张关于农业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主雇关系调节与灾害防治的关系。第四部分编为第五篇《农业实践与乡土文化》，先论述《补农书》及其作者与明末清初江南耕读文化的关系，再分析该书的农谚，接着将《补农书》与《春蚕》作比较研究，最后从伦理学的角度对《补农书》进行解读。上述四个部分各有侧重，其中，第三方面的内容较多，属于重中之重，因而分成两篇。各章之《讨论》或《小结》部分皆注意揭示《补农书》的有关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启示。话语较少者目为小结，略多者称为讨论，且予编号。

研究方法最基本的是文献分析。本书主要以《补农书校释》中的有关资料为基础，结合其它文献进行阐述。其次是量化分析

方法。沈氏、张履祥是严谨的农业科学家，其原著中不乏数学语言，为量化分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比照所谓学科归属之说，农业历史文化研究实际上是最具学科交叉性的学问之一。昔日游修龄先生修炼出经典性的《中国稻作史》，曾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的嘉奖。当其接受审查时，无意之间引发出一场争执：它到底应归入文科还是理科？后来，专家们特意为之设立一个文理兼备的临时评审组，以示谨慎和公正。这段佳话，的确意味深长。值得一提的是，本项研究的前期成果之中，大部分论文载于人文社科类杂志，但也有两篇跻身于自然科学类刊物之中。笑而言之，这也不枉笔者获得理学学位一场。为顺应学科分化与综合的辩证发展大趋势，本书试图将经学（除儒家经典之学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亦不妨理解成现代经学之一）、农史学（其中基本的是农业科技史学与经济史学）、环境史学、荒政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结合起来。

目 录

序	(1)
绪篇	(1)

第一篇 伟人思想与农学杰作

第一章 毛泽东与《补农书》及其相关问题	(2)
---------------------------	-----

第二篇 农业技术与农村经济

第二章 从《补农书》看张履祥与水利问题	(18)
第三章 从《补农书》看农具利用问题	(32)
第四章 从《补农书》看农村手工业与商业问题	(44)
第五章 从《补农书》看农村价格及其相关问题	(60)

第三篇 生态环境与社会调适

第六章 从《补农书》看肥料技术与生态农业	(84)
第七章 沈氏与《奇荒纪事》	(105)
第八章 从《补农书》看自然灾害与荒政措施	(117)
第九章 从《补农书》看灾异与社会调适	(132)